

學思堂文集

杨翼骧



古代未
知建立
这一学科

史字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早已有之。
有论著可考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勰《文心雕龙》、
这一名称。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才由梁启超
即在北大讲授中国史学概论，此名称，
提出这一名称并倡导写中国史学史，
陆懋德（北师友）均发有讲义，但未正式出版
的书，其中多有史学史一章，
三书出版，在史学史中开此先河。可说刘山

楊翼驤 著

學子思堂文集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忍堂文集/杨翼骧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南开史学家论丛·杨翼骧卷)

ISBN 7-101-03717-8

I. 学… II. 杨… III. 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763 号

责任编辑:柴剑虹

南开史学家论丛

学 忍 堂 文 集

杨翼骧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河北廊坊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4³/4 印张·35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101-03717-8/K·1566

缘 起

张国刚

壬午仲秋，“南开史学家论丛”将付梓，兹赘片言，以明缘起。

先是，己卯春，魏宏运先生、刘泽华先生偕余应约赴北京范曾先生寓所，商谈成立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之事，时范公友人企业家白君、许君亦在座。是年秋，南开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举行范曾书画展，一时士林耸动，学界泰斗季羨林、数学大师陈省身且亲临剪彩焉。翌年三月，东方文化研究院获批准建立。当是时，范公及白、许二君慷慨捐赠，资助研究院之历史学图书出版，并冠其名曰“范伯子史学基金”。伯子者，范曾先生之曾祖父，清季同、光诗坛领袖范当世先生也。于是，遂有刊印“南开史学家论丛”之议。推泽华先生为主编，余为襄理庶务。第一辑八书，曰《及时学人谈丛》、曰《伯伦史学集》、曰《陋室文存》、曰《古史集林》、曰《探径集》、曰《学忍堂文集》、曰《三学集》、曰《锲斋文录》。其作者或已归道山，或年届耄耋，并为史界巨子，南开名师。编委会同仁皆深荷其教泽，仰止之思，惓惓不已。八书问世，既为吾师庆，亦为学术庆，且喜将有以鸿文传教后昆也！

中华书局及各界友人鼎助论丛出版，谨申感激之忱！

壬午八月初十五日谨记于南开园

南开史学家论丛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

范 曾 李治安 陈振江 张国刚

主 编 刘泽华

副主编 张国刚 李治安

总 序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自开设科系至于拓为学院,前后垂八十年矣。肇始之季,史界翹楚,皆欣任教席,其最著者为梁启超、蒋廷黻、蔡维藩、刘崇鋮、范文澜诸公,此数人皆根于博识而详于考实者,于近世皆以典著精审为世所共识。南开史学之博约宏贍,可谓其来有自。解放后院系调整,北大与清华两府史魁郑天挺、雷海宗于南开树帜,一时卓越史家吴廷璆、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黎国彬、来新夏、辜燮高、魏宏运云集而景从,自此以降,半世纪来蔚为国中史学营垒,气象葳蕤。后继者潜修锐进、不坠薪传,欣睹其旺,南开史学院誉薄海滋,岂徒然哉。

史之为学,司马迁概之曰“述往事思来者”六字。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乃研究史学之大旨。其博学之,谓勿以疏漏也;审问之,谓整纷剔蠹也;慎思之,谓祛惑释疑也;明辨之,谓去伪存真也;笃行之,谓济世匡时也,此数事于南开史学名师之文中有之矣。

即以郑天挺先生《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为例,经先生钩稽玄微,清代统治者,实为汉满蒙古之混合血统,此论既出,则清室“以龙兴东土、朱果发祥之贵胄自炫”之说即告溃萎。先生又详证满洲实为部落之名称,“与国无涉”。而侵略者骄横,欲以清之末世溥仪而立满洲国,于史无据,可称谬妄极矣。读毕真似闻老吏断狱、要言不烦,不禁击节喟叹。又以王玉哲先生《周初三监及其地望问题》一文为例,先生揆诸当时情势,证以史籍、考古,以为周初实力所统辖者有限,“武王所置三监之邶和鄘绝对不可能远到河北北部和山

东中部”。予王国维凭诗人之想像以为“邶即燕、鄘即奄”之说以不复容辩之否决。它如清姚鼐、近人顾颉刚有关三监之说，亦一一驳析，至此三监历史之悬案冰解壤分，豁然大朗。王玉哲先生固温良恭谦让之君子，而于学术涇涇然如此，亦自感责任綦切，不为先贤讳也。

六十余年前杨志玖先生以英发少年，于浩繁之《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确来中国之铁证，凿凿之说，与西人伯希和并肩，为硕学汤用彤、向达先生所激赏，遂为史界定论。亦有立异眩世者东来访问，见先生蔼然长者，抱“以文会友”之雅怀，不禁肃然起敬，遂偃旗息鼓西归。要之史学家必有“坚不可摧的证据”（王玉哲先生语）然后立有益当代，泽被后世之言说，前辈懿范，岂可轻忘。

史家之道德，亦有大谬不然者，或如鲁迅先生所讽，为历史“涂抹些自欺欺人的脂粉”；或如刘歆篡改史乘，以为王莽立言。此类史蠹，不绝如缕，为史家立障，难辞其咎。清乾嘉以来，吴、皖学派，考据鼎盛，功不可没。南开史家以勘讎考据、细绎群书之学视为立论之基石，而不以先验之立论而检索史实为能事，后者直为治史之大痼。知行合一，固为至论，而一切真知，皆来自治史之实践，必以历史之真面为终极追逐。郑天挺先生所言“真理标准决定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历史科学是从争鸣中发展起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之出为1961年，可谓言简意赅，深挹肯綮。

乙未之夏我以十七岁考取南开大学历史系，至今四十六年矣，彼时以能亲聆史学大师髣髴为最大荣幸。其时诸师亦皆壮年，滔滔雄词如坐春风，雷海宗先生开世界上古史，其博学强记、考索史实，略无半句废言。至历史紧要处如西罗马帝国之覆亡，则谈兵说剑、飙风扇发，泉飞藻思若此，恐同代诸公，难有望肩者。又如谢国桢先生授南明史略，则对半壁破碎河山中金陵福王、福建唐王、广西桂王

之消长慢慢道来,其史籍之烂熟于胸次,如数家珍。不期反右中雷海宗先生为康生所深恶,必除之而后快,定为史界极右,今虽彻底平反,而枵触前尘,侧焉涕下,曷胜今昔之叹。

今南开大学史学家论丛出版,刘泽华兄属为序,亦欲述其渊源、敦励风尚,以传于后之来者,使知青嶂之远、白云之深,谨惶恐奉命如上。

范曾 壬午夏於南開

自序

出版学术论文集,本来是我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自两年前,张国刚先生就几次表示要我编辑文集,当时感到一些主要论文业已反复转载,再出文集,似乎不大必要,况且文章数量不多,因而未作安排。然而,刘泽华先生亲至寒舍指点策划,并且代表范曾先生恳切动员,厚意绵绵,感人肺腑,万无再行推却之理!但因身体多病,视力不佳,存稿散佚,编辑维艰,于是委托学生乔治忠、孙卫国二君收集编排。乔、孙二君,裱糊发黄变脆的旧报纸,查找刊物,复印排纂,花费不少时间、精力。今装订成册,不日付梓,故口述数语,亦令乔、孙二君整理成文,聊为自序。

本书定名《学忍堂文集》。“学忍堂”者,我家的祖传堂号,盖祖上以来,世代读书,清代出过十名进士,可算得上书香门第。以祖传堂号题作书名,一是表达对祖辈的怀思,二是对后学有所寄望。“忍”字多义,此处乃“忍耐”之“忍”,且“忍”与“韧”通。“学忍”一词,出自曾国藩家书,曾氏注重忍性,凡事要忍,忍为美德。前人对联中有“万事忍为先”一句,而真正做到却着实不易,是则人人须学忍,而后能够忍。血气过刚,毫无忍性,小有不满,暴跳如雷,非读书人气质,十之八九,难成大事。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此之谓也。故曰首先学忍,方能明晰理解“是可忍,孰不可忍”。至于何者当忍,何者不忍,何者不忍即为忍,何者忍即为不忍,诸君子见仁见智,唯于学忍之中细细体味而已矣!“忍”之义,岂不大哉?

几十年往事如烟,多少音容场景,已经依稀仿佛,而足堪追忆者

有之,无须追忆已刻骨铭心者亦有之。曩者 1939 年,精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引发我对史学史的兴趣,以后凡关乎史学史的论著,皆觅而阅读,渐有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之志。1940 年,西南联大在学,撰成《晋代之史学》一文,其中有《晋代史官表》,得姚从吾教授热情勉励。1942 年,时为北京大学助教,姚从吾先生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令我为之抄录资料备用。查阅与抄录资料过程中,忽悟应当编辑一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作为研究的基础。如今此书出版了三册,最早动因,乃在 60 年前。

后姚先生赴河南大学出任校长,经向达先生鼎力推荐,我方开设中国史学史选修课。师长们的勉励指导,使我受益非浅,而客观环境、工作安排乃至其他社会因素,又往往令我不得不放下史学史,作其他方面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因此这本小小的文集,虽以史学史研究为主,但毕竟内容不一,人生轨迹如此,也只好如此展现于读者面前。与叶振华、乔治忠二君曾经合作发表论文各一篇,征得二君同意,收录集中,最后《说中国近代的史学》、《谈治学与做人》两篇,是乔治忠君根据讲课记录整理写定,皆经我阅读认可。

忆昔向乔治忠、姜胜利、叶振华、孙卫国等众弟子指授门径、批阅论文,亦曾尽心尽力;而今不仅这本文集的编纂,其他诸事,也得学生们效力实多。思前想后,感慨万千!现今乔治忠、姜胜利等等,已撑起南开史学史专业,分赴各地的弟子,亦各有成,是足慰平生之事。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有“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之语,还应补上一句“尽心育后学,胜著等身书”,为人做“教书匠”者,幸莫大焉!福莫大焉!

杨翼骧

2002 年 10 月

目 录

自序	(1)
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	(1)
班固的史才	(7)
三国时代的史学	(12)
漫谈历史的研究	(23)
读史笔记——西园八校尉	(32)
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	(35)
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	(49)
先秦史学编年	(69)
三国两晋史学编年	(89)
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	(138)
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	(151)
裴松之和范晔	(171)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174)
刘知几与《史通》	(197)
南北朝史学编年	(233)
五代十国史学编年	(306)
应当继承司马光认真负责的精神	(342)
《贾谊集校注》序	(347)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348)
蔡珪卒年辨	(385)

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	(388)
中国史学史绪论	(408)
悼念杰出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417)
说中国近代的史学	(420)
谈治学与做人	(452)
附录:杨翼骧先生学术系年	(462)

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史事的真象。一部历史书,应当是史事的真实记载。我们对于一部史书的评价,必须依据它记事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定。虽然完美的历史著作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如文辞的优美,叙事的生动,体例的精当等,但只是写作的技巧,而不是唯一的基本原则。如果记事真实,而写作的技巧稍差,仍不失为良好的历史书;反之,若仅注重写作的技巧,而忽略了记事真实的原则,那只能算是历史小说或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所以一个从事历史著作的人,必须具有求真的精神,讲求求真的方法。

司马迁是我国第一个历史家,他所作的《史记》一向被推崇着,称颂着,在我国史学史上占着最高的地位。不过有许多人仅注意于他的写作技巧,而忽略了他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如班彪称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苏轼说他的文章“疏宕有奇气”。固然,司马迁文章的优美,叙事的生动,为后来的史家所不及;但是我们站在史学的立场来读《史记》,应当首先注意研究他求真的方法与精神。

司马迁以卓越的才学,深邃的功力,写出了一部贯通三千年包括五十余万言的史书,他的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深切的研究。不过,若是详细的寻绎出来加以阐述,又非一篇短文所能办到,所以本文只能举出重要的几点,来大略的说一说。

一、努力于材料的搜集

从事一部史书的著作,必先广搜史料,因为写作历史,不能凭空臆说,须有切实的根据。为了求得史事的真象,自然要博览广征,慎重史料的整理与采择。司马迁自言“细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而且身为史官,有阅览典籍的便利,对于材料的搜集,当然是不遗余力的。但是班彪班固父子论到《史记》的撰修,仅说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郑樵的《通志》总序里也仅说他“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并说:“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我们细读《史记》之后,便知道司马迁所根据的典籍绝不止此。班氏父子的话太笼统,郑樵的话太武断,未免厚诬前贤了。

在《史记》一书里,司马迁常常提到他所根据的典籍,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殷本纪》)“吾读《秦记》……”(《秦始皇本纪》)“余读谍记……稽其历谱谍。”(《三代世表》)“余每读《虞书》……”(《乐书》)“余读春秋古文,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乃兄弟也。”(《吴太伯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管晏列传》)“余读《司马兵法》,闕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司马穰苴列传》)“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仲尼弟子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商君列传》)“余读孟子书。”(《孟子荀卿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屈原贾生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酈生陆贾列

传》)“余读功令……”(《儒林列传》)等等;然而这些不过是他顺便提及的话,已可证明他的作史不仅根据少数的几部书籍,是广搜博采的。班氏父子的话虽然笼统,只举出几部主要的书,但仍承认他“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至于郑樵武断的说他只“跼蹐于七八种书”,则是无的放矢了。

总之,司马迁除了《诗经》、《尚书》、《春秋》、《左传》、《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而外,博采诸子百家之书,当世学者之文,以及一切公文法令、章程、礼仪。也就是说,凡是当时所有的史料,他都尽最大的努力去搜集采用了。

二、实地的考察

《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一段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采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秦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二十几岁的司马迁,已经历尽名山大川,足迹遍于四方了。综计《史记》里他的游历行踪的记述,我们知道他到过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十余省,中国本部游历殆遍。并且每到一处,都留心史事,以实际的情形与典籍的记载相对证,来考察史事的真象。这种实地的考察,是最可贵的求真的方法。

在《史记》里常常记述到这种实地考察的结果,如“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五帝本纪》)“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土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封禅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

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河渠书》）“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齐太公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伯夷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春申君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蜚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这些例子，都是由实地考察的情况与典籍的记载相印证。司马迁叙事生动，不但靠着他的文采，还要藉赖真实的记述。因为只有真实的记述，才能亲切动人，尤其他叙述秦汉之际的史事，有声有色，非经过实地的考察，不能那么真切生动。所以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司马迁实地考察以求得史事真象的精神，确乎没有人足以比拟，是最值得治史的人注意与研究的。

三、亲身访问

司马迁因为留心史事，极意求真，每到一处，除了实地考察历史的遗迹，还要从事于轶闻遗事的访问。实地考察是所谓“亲见”，亲身访问是要“亲闻”，亲见亲闻，才能得到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在《史记》里，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这种例子。如：“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世家》）“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

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信陵君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樊酈滕灌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这一段下面说：“案：他广，樊哙之孙，后失封，盖尝讶太史公序萧、曹、樊、滕之功委具，则从他广而得其事，故备也。”这些都是司马迁亲身访问后，再作文字的记载的例子。尤以叙述汉初的事迹，由于亲身访问得来的史料最多。像《高祖本纪》里关于高祖的故事，《项羽本纪》里鸿门宴的情形，《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及《留侯世家》里萧何、韩信、张良的故事，以及《曹相国世家》、《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篇里描写人物的个性，都非常详细生动，多半是得自“亲闻”的材料。

四、专心锐志完成著作

司马迁在撰著《史记》尚未完成的时候，突然因李陵的案件，连累背负罪下狱，并且受了残酷的宫刑。这实在是人生最痛苦的遭遇，最大的打击。然而，他为了使几千年的史业不致泯灭，他一生所费的精力心血不致付诸东流，仍然含痛忍辱，来完成伟大的著作，他在《报任少卿书》里曾叙述自己的苦心高志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